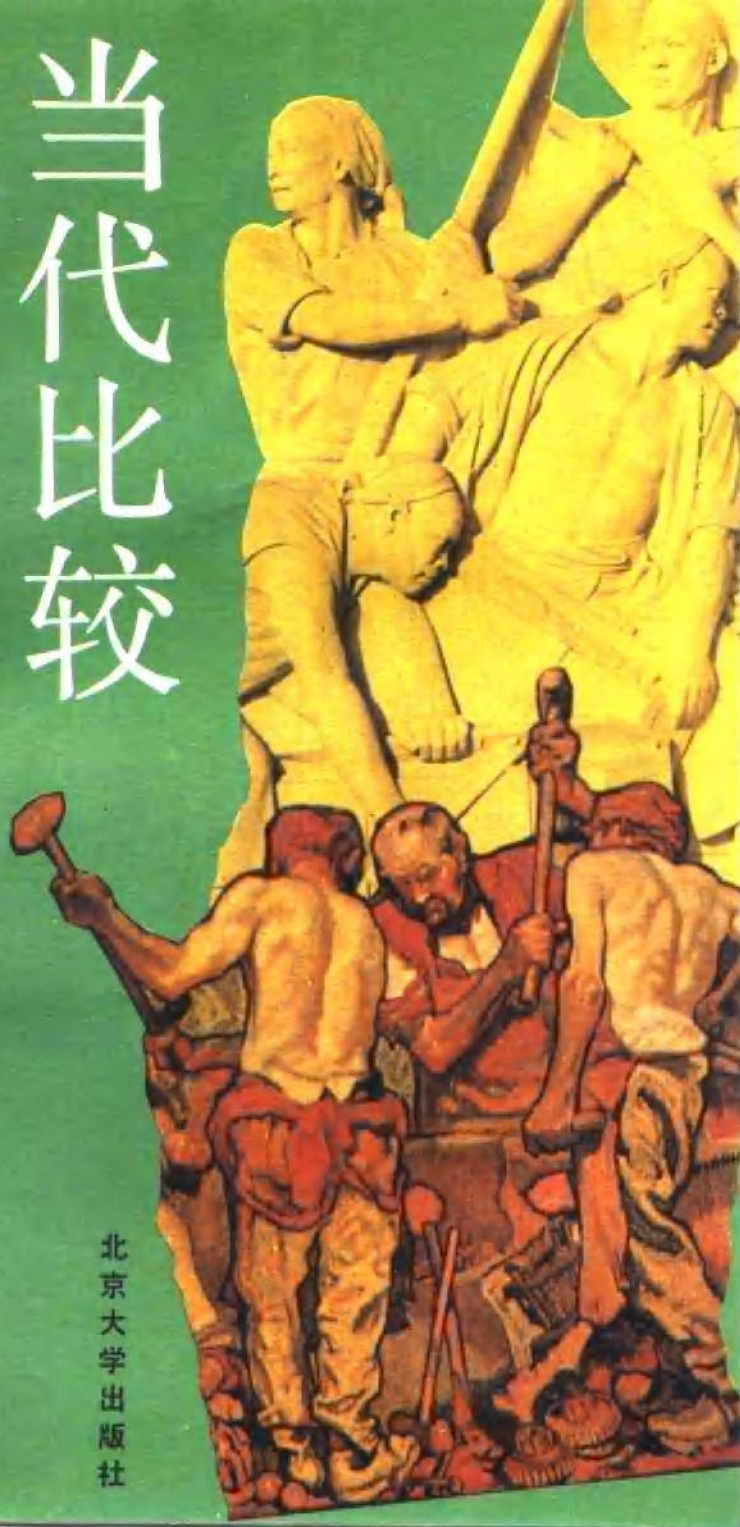


当代比较史学

● 范达人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比较史学

范达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比较史学

范达人 著

责任编辑：刘 方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雪花日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160 千字

1990 年 2 月第一版 1990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301-01023-0/K·074

定价：3.75 元

目 录

比较史学的理论、模式与方法·····	(1)
当代美国和苏联的比较史学·····	(20)
港台比较史学名家述评·····	(38)
“皇权主义”异同论·····	(67)
“宗教色彩”的比较研究·····	(77)
当今中国史坛上的比较研究“热”综述·····	(99)
“史学研究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	(114)

附录:

马克·布洛克与历史比较的逻辑

·····〔美〕小威廉·西威尔 (127)

美国的比较史学·····〔美〕彼得·科尔钦 (141)

比较史学·····〔美〕乔治·M. 弗雷德里克森 (165)

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捷〕密罗斯拉夫·荷罗赫 (184)

比较方法、类比推理和逆向方法

·····〔波兰〕耶日·托波尔斯基 (192)

苏联学者论历史比较法·····〔苏〕B. B. 伊万诺夫 (197)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苏〕Э. Л. 梅尔科尼扬 (206)

列宁的历史类比和对照方法

·····〔苏〕A. A. 斯塔爾琴科 (214)

近年来比较史学论文目录····· (230)

比较史学的理论、模式与方法

近年来历史比较研究开展的情况，诚如有的同志概括的：它“引起我国史学工作者日益浓厚的兴趣，或者积极提倡，热情鼓吹，或者具体实践，认真探索。虽然还只是肇端伊始，也不免偶有失误，但是初步取得的进展已经表明，科学的历史比较研究是正确发现和深刻阐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重要方法。”^①我很赞同这一估价，但历史比较研究还有待于深入探讨。要深入，必须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及其结合上，回答人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促使它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一步发展。

一 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依据问题

历史（包括中外历史）能不能进行比较？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

实际上，当我们在进行历史叙述或评论时，不管自觉不自觉，往往在做潜在的比较。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还不是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较而言吗？又如，我们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世所罕见。这当然也是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确是处处时时在做潜在的比较。有的学者说：“没有比较，不仅认识的过程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人类的任何一种活动都是不可思议的，只是因为有了比较，事物同异的确定、抽象过程本身和概念的形成才成为可能，否则任何一种知识都不能存在。”^②这话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所从事的历史比较研究，不仅仅是潜在的比较，而且要自觉地运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历史；不是偶尔使用一下比较对照的方法，而是系统地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

历史的比较研究，是指对历史上的事物或概念，包括事件、人物、思潮和学派等等，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比较对照，判明其异同，分析其缘由，从而寻求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的一种方法。

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依据在于：

第一，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结合。所谓统一性，主要是指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具体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态的依次更替。不论各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地理位置、政治体制等方面如何不一，但必然有共同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方面的特征。另一方面，各国具体的历史发展又具有多样性，百姿千态，丰富多彩。历史发展的这种共同性与差异性，构成了历史比较研究切实可行的科学依据。

第二，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国进入同一社会形态有早有晚，发展程度有充分不充分之别。纵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你追我赶，后来者居上，一幅曲折前进的画面。先进入某一社会形态的国家，为行将进入者预示发展的大致方向，而后进入者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世界历史的不平衡性，也成为历史比较研究可以进行的实际前提。

第三，历史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都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历史演变进程中，大至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小至具体的某人某事，均处在互相联系之中。历史上的各种事物，不仅在时间上以先后连续性相互联系着，而且还在空间上以周围事物的依赖性相互联系着。历史无论从纵的发展还是从横的断面看，都是又有联系又有区别，均可作比较。“相比较而存在”，是客观的实际。

总之，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运动观和历史观，是历史比较研究坚实可靠的理论依据。

还应当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主张和提倡科学的历史比较研究，而且还亲自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历史比较研究。

马克思说：“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③大家知道，《资本论》是马克思一部光辉的代表作。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论及此事。他写道：“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④

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一部用唯物史观研究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名著，从一个方面讲，也可视为用比较方法研究历史的范例。他把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与1848年的德国革命进行比较，指出两者类似之处异常明显，其间的差别也是十分明显，从而得出一系列规律性的认识。在书中，恩格斯还对马丁·路德与托马斯·闵采尔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了十分精彩的比较。

最近翻译了一篇文章，题为《列宁的历史类比和对照方法》，作者斯塔林钦科引用大量列宁的论述与历史比较研究的事例，说明“列宁广泛而多方面地使用了历史类比方法。”

史学界对斯大林的一句话有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历史的比拟总是冒险的。”比拟的俄文原文也可以译为“比较”、“对照”。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句话的背景和原意：斯大林这句话，出自他1931年12月与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在谈话时，路德维希把俄国历史上的封建的沙皇彼得一世与苏联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相提并论，并认为后者是前者的继承者。在斯大林

看来，这种说法是不能苟同的，因而答道：“绝对不行。历史的比拟总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历史果真不能比较吗？不然。因为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对彼得大帝和他本人进行了历史比较，他还形象地比较了列宁和彼得大帝，说：“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⑥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大家熟悉的。在《毛泽东选集》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比较研究的事例。有国情比较、阶级比较、理论比较、历史比较等等，而历史比较又有多种形式。“有比较才有鉴别”，毛泽东同志往往通过反复比较，把握事物的实质和特性。

综上所述，想说明这样一个论点：科学的历史比较研究，在理论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实事求是的原则，科学的历史比较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 历史比较研究的必要性问题

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确非易事。它不仅要求至少熟悉两方面的史料，而且透过现象、分清异同、探求规律，也是相当困难的。我在教学过程中，深有此感。

历史比较研究的困难性，可以说有一定的普遍性。国外一些学者也著文大喊其难。他们说，比较史学这门学科目前仍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缺乏方法论的训练，要求专家鉴定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区的比较史学著作有困难，但是最严重的问题也许是有关比较史学论著的实际写作问题。

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困难呢？我想，就中国史学界来说，应当知难而进，而不是知难而退。因为开展历史比较研究，不是某些人的兴趣、偏好，而是历史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

历史科学的任务，概括地说有三条：一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总结历史经验；三是探求历史规律。这三条可以说都离

不开历史的比较研究。历史类比具有再现历史的作用。摩尔根通过历史类比的方法，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人类社会上古历史的一些重要情况。至于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历史规律，更是非比较研究不行。所谓规律性的东西，必然具有重复性、常规性的特征。孤立地研究单个事物，不易发现规律，只有综合比较研究，才能总结经验，发现规律。

研究和编写世界史，不能不搞比较研究。从世界性大事的选择、结构章节的布局到具体论述中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的阐发，无一不需要宏观的历史比较研究。有的学者甚至说，比较历史成为世界史能否写成功的条件，不谈比较历史，谈世界史是空洞的，比较历史可以说是撰写世界史的过程和方法。当然，这样说并不恰当，但强调之意，有参考价值。

研究中国史，也有进行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之必要。周谷城老先生大声疾呼开展中外历史比较研究，是众所周知的。季羨林教授在《比较文学译文集》序言中写道：“比如研究中国历史，具体地说研究中国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问题，争论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没有大家都承认的看法。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缺少比较的方法。如果把其他文明古国，比如说印度，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细致地加以分析，加以对比，会大大扩大我们的视野，会提供给我们很多灵感，会大大有助于讨论的推进与深入。其他学科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其中也包括人文科学，想要前进，想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除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外，利用比较的方法是关键之一。”在这里，季先生已经把道理说得很透彻了。

在我看来，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其意义和作用，主要有以

下几点：

第一，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一种宏观地考察历史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克服研究历史的狭隘性，把所研究的个别事物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从而为更好地综合概括创造前提。法国比较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在强调历史比较研究时指出，这种方法可以克服欧洲史学中国家孤立主义倾向。这种所谓“国家孤立主义”倾向，就是用单一的国家因素，来解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例如，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必须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较，在对比研究中，去剖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阶级关系等方面的特点，才能逐步弄清症结所在。丁伟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与宏观历史研究》一文中，把历史比较研究法作为宏观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他说：“或者通过对于不同时期的历史比较研究以求常求变，或者通过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的比较研究求同求异，这样才可以从宏观上认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如果不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历史间求常求同，发现和把握一般历史规律，那么人类历史便成为无共同规律可循的这样或那样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如果不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求变求异，发现和把握历史的特殊规律，那么人类历史便成为没有血肉没有丰富内容的干瘪的哲学教科书。”的确，研究历史，离不开纵横比较，宏观考察。

宏观的比较研究还有助于发现事物之间的同异，感到有新的问题需要解释，促使新思想观点的产生，从而扩展历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不少学者通过比较研究，突破过去一些传统看法，提出新的学术见解，从而活跃了学术讨论的气氛，推进学科的发展。

第二，历史的比较研究，是鲜明的很有说服力的方法，是研究历史的一个新角度。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过，人类有三种知识，即理论知识、实践的知识和鉴别的知识。鉴别的知识靠比较来获得。比较研究的长处就在于使事物具有极大的鲜明性。“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两论相订，是非乃见。”^⑥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给弗·梅林的信中说：“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篇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⑦现在，提倡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其用意之一，就是要我们进行历史的比较，引导我们把旧中国与新中国加以对比，从今昔历史对比中，振奋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

说历史的比较研究，是研究历史的新角度，还有两层意思：一是历史界许多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通过比较研究，或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二是提倡开展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这样做，不仅拓展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会开阔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的思想，在严肃认真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预见会结出新的科学成果。

第三，历史比较研究，能起一种结合作用，促进历史研究中理论与史料的统一。

在历史研究中，既要克服空洞理论化的倾向，又要防止只重史料、不注重规律性探求的倾向。历史的比较研究，首先要求掌握大量材料，要以翔实无误的史料作为基础；而比较的目的又在于寻求规律性，要作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概括。因此，提倡历史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纠正上述两种倾向，努力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

第四，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一种历史类比的方法，可以起到预见未来的作用。历史类比也是一种推理的方法。根据两个历史现象在某些方面相同或相似，而推导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同

或相似。其公式如下：

甲事物具有子、丑、寅、卯属性，

乙事物具有子'、丑'、寅'属性，

因此，乙事物可能具有卯'属性。

列宁在1917年6月，把1848年2月法国革命以后的情况与1917年2月革命后俄国的形势，作了历史的类比，估计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镇压和小资产阶级妥协、叛卖的可能性。列宁通过历史类比得出的预见，两个月后，即9月初，当科尔尼洛夫把军队调往彼得格勒企图摧毁革命力量时，都得到证实。苏联学者瓦西利耶夫在《列宁和社会预见》一书中，有专门一节谈《历史类比的预言意义》，他认为“已经经历一定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的经验，对于行将经历这个阶段的某个国家提供了有关自身未来的一定启示。”

此外，国外一些学者还认为，历史比较研究，能够起一种验证假说的作用。有的人称之为“间接实验法”。他们认为，如果历史学家选择最典型的材料，把所研究的事物放到能够阐明历史活动的理论体系之中，采取多方比较的办法，可以较近似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否定不正确的假说，起自然科学中通过实验所发挥的作用。

美国比较史学学者雷蒙德·格鲁，是《社会学与历史学比较研究》杂志的主编，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历史比较研究的功能。他说：“审慎地使用比较研究，对历史学家在研究工作的四个阶段能给以帮助，即：①提出问题阶段；②鉴定历史问题阶段；③制订适当的研究规划阶段；以及④获得和验证重要结论阶段。”⑧这样来论述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对我们也有参考价值。

三 历史比较研究的模式、条件和要求

历史比较研究，具体的模式可以多种多样，百花齐放，不拘一格。一般常用的有三种比较模式：

1. 历史类型性的比较。这类比较，一般是由于共同规律起作用而产生的事物之间的比较。如同属奴隶社会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之间的比较；东西方封建制度的比较；英、法、中、俄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戊戌变法和俄国的1861年改革之间的比较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途径的比较等等。

这种比较，应用最多，范围可大可小，只要属于同一类型就行。然而，类型的划分，取决于史家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科学历史观的指导显得特别重要和必要，否则会引向谬误。

2. 历史“渊源”上的比较。这类比较的对象，限于有亲缘联系的事物之间。如英国人与美洲英裔移民之间的比较；美洲印第安人与亚洲蒙古利亚种人的历史比较。所谓“扶桑国猜想”之谜，中国人是否先于哥伦布一千年到达美洲的问题，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应该从历史、考古、人种、语言等方面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3. 历史上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的比较。所比较的国家，应是有联系、有相互影响的。如中日两国历史上相互影响的比较，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比较，东西文化交流比较研究，均属此列。

从时间范畴来分，可有同期比较，如法国历史学者罗兰特·莫斯涅写过一本关于17世纪农民起义的书，他把发生在17世纪的法国农民起义与俄国拉辛起义、中国李自成起义加以比较。亦可有异期比较，如苏联学者比较俄国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也可分为垂直比较与并行比较。

从空间范畴来分，大可以大到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比较。“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⑩ 这是比较社会形态之间区别后得出的结论。小可以小到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乃至书籍等等之间的比较。

马克思把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进行比较，他指出：“1648年的革命是17世纪对16世纪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是18世纪对17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完全不是这样。……三月革命决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世纪以上。”^⑪ 这样的比较研究，更鲜明地揭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特性。

“把1905年俄国军队中的起义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军人起义对比一下特别有趣。当时政治运动的领导者几乎全是军官，即一些贵族军官，他们在拿破仑战争的时候，接触到欧洲的民主思想，受了感染。士兵群众当时都还是由农奴组成的，所以很消极。1905年的历史却完全相反，当时的军官，除少数人外，不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就是带有直接反革命的情绪。而身穿军装的工人和农民则是起义的灵魂；运动成了人民性的运动。”^⑫ 确如列宁所说，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中，参加参议院广场前起义的部分士兵，甚至不知起义的宗旨，他们跟着贵族军官高呼：“康斯齐都采阿”（俄语“宪法”一词读音），误以为是指他们准备拥立的大公康斯坦丁的夫人。而高喊：“康斯坦丁和他的夫人康斯齐都采阿万岁！”而在1905年革命中，身穿军装的工农，则具有革命的觉悟，成为起义的灵魂和主力。

刘大年同志在1961年第3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论康

熙》一文，其中对康熙与彼得大帝进行了比较。文章说：“康熙和彼得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他们取得权力的手段甚至是戏剧性相似。康熙十六岁指挥‘布库戏’小儿擒权臣鳌拜，实际掌握权力。彼得十七岁靠他训练的‘娃娃兵’夺取权力，幽禁索非亚，他们走的道路远远有别，但都又是走着一条具有坚韧一贯、发奋为雄特色的道路。”接着他又分析两者面临的社会条件，斗争形势的差异及其根源。比较得颇有启发性。1980年冯至教授在瑞典科学院发表的论文是：《杜甫与歌德》。对中国和德国历史上两位杰出的诗人在诗与政治、诗与自然关系上，进行了比较研究。周传儒老先生回忆他两位老师的文章《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写得很有意思，交叉对比，夹叙夹议。文中写道：“梁师侧重经世致用一面，王师侧重训诂考据一面。梁善综合，好作系统研究，所有著作，多洋洋洒洒，远瞩高瞻，不论总论分论，自成系统，自成一家之言。王师则点点滴滴，好为分析比较，作专篇，不著书，据材料之言，证明一事一物即是，不旁搜远绍，不求系统，不求完整，不为著作作添枝叶。梁师贵通，王师贵专。梁师求渊博，王师求深入。”历史人物的比较，是历史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比较得合乎科学，恰到好处，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马克思对描述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政变的三本书进行比较分析，评论得极其深刻精辟。马克思指出，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著的《政变》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

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马克思本人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是说明法国的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⑩

总之，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纵横驰骋于中外历史之间，古今贯通，上下左右求索，熔种种材料于一炉，在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炼出真知灼见的精华。

然而，必须指出，历史的比较研究是有条件的：

首先的一条是，必须是可比的。拿来作比较的历史事物，从一定角度讲，应是可以比较的。不能把没有任何角度联系的事物加以比较。所谓可比性，根据一些同志分析，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用来作历史比较研究的，必须是在社会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两个以上的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经过两个以上的不同发展阶段。二是要符合各类历史比较的要求。就历史类型性比较而言，所比较的事物，必须是从一定角度讲，是同类的；否则不是作历史对比，而是信口开河。三是要把所比较的事物放到一定的范围之内进行具体的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比较的具体性。“倍尔西阿尼所以是一位无比的歌唱家，正是因为她是一位歌唱家而且人们把她同其他歌唱家相比较；人们根据他们的耳朵的正常组织和音乐修养做了评比，所以他们能够认识倍尔西阿尼的无比性。倍尔西阿尼的歌唱不能与青蛙的鸣叫相比，虽然在这里也可以有比较，但只是人与一般青蛙之间的比较，……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才谈得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比较，在第二种情况下，只是他们的种特性或类特性的比较。”^⑪

对于错误的历史比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作过尖锐的批评。列宁针对费尔纠逊在《希腊帝国主义》、弗兰克在《罗马帝国主义》等书中把古代“帝国主义”与现代帝国主义等同起来

错误地历史类比时，指出：“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一般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这样的议论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怪诞不经的吹嘘，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拿来相提并论那样。”^⑭列宁甚至严厉地批评司徒卢威把马克思主义与福马·阿克维斯基的繁琐学说相比较，说：“无疑是玩弄庸俗的类比，更确切些说，这简直是小丑行为。”^⑮

再一个重要的起码的条件是，要弄清楚拿来作比较事物的情形，要尽量确切地把两种事实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确切地把一系列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各个发展阶段间的联系研究清楚。这一点要十分强调。这是关系到在历史比较研究中是否坚持唯物主义原则的问题。

三是要深入。事物之间的异同，有现象的，也有本质的。科学的比较不要限于单纯地罗列一些表面的同异现象，而是要透过现象，分析原因，从共同性中揭示矛盾的普遍性；从差异性中阐明矛盾的特殊性，使我们对事物的观察更深入。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说：“假如一个人看出当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枝笔和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東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的，鲸鱼、蝙蝠、狼，形态千差万别，特性也不一，鲸鱼似“鱼”善游水，蝙蝠象“鸟”会飞翔，狼属走兽长于奔驰。但生物学者通过本质比较，看出“异中之同”，确证鲸鱼非鱼类，蝙蝠非鸟类，它们同狼一样，均系哺乳动物。又如，沙鱼、鱼龙和海豚貌似，都善于游泳。生物学家从本质的比较中，